

意，发奋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主动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历次革命运动，尽心尽力地做好本岗位工作，从而对为自己参加一分力量而得到的巨大胜利和迅速变化的新中国，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席产生了无比的崇敬，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信不疑。这也是一个客观实际。这些本来是由一种带根本性的伟大历史转变所形成的深刻信念，这几年逐渐变得淡漠起来——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次认真学习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胡耀邦主席的讲话，通过全面回顾六十年来革命历程，使我这淡漠的信念又逐渐清醒过来；不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多么深、重、广，但从革命的全剧说来，还只是一段较长的可悲插曲而并未成为一个悲剧性的终场——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伟大的转折和展示着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的总趋势了吗。那么，对于那些心有“余悸”的革命知识分子说来，尽管他们的“余悸”来自客观实际，然而当客观实际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这种“余悸”如果还未彻底消除，那么这只是他们思想落后于现实的一种表现，只是自己限制自己主动积极地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的精神枷锁。只有细察深思从客观实际发生的变化，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变化了的实际，才能真正彻底消除那些“余悸”，才不会自己限制自己的才能的发挥，才可能主动积极地去担负起自己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任务。拿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除在本职工作单位（北图）被隔离审查，在业余的服务领域，举重界，也有人把我作为反动权威来批判。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难免还心有“余悸”。但是，现在客观上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1974年我又回到了北图，从1979年起又被国家体委恢复了国家级举重裁判的光荣职称，后来，中国举重协会又重新推选我为裁判委员会主任，1980年又被国际举重联合会

批准为国际二级举重裁判。今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美国图书馆自动化专家阿弗拉姆应北图邀请来华讲学，仓促决定我任翻译，接着我又作为中国举重协会的三个代表之一派往匈牙利塔塔城参加“国际举联第一届教练——裁判——医学讨论会”。这次出国、没有随同的翻译人员，由于国际举联的第一正式工作语言是英语、由我用英语联系，直接表达意见。每逢这种场合都难免浮现出是主动工作抑心悸难乎？由于近三年来我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组织的的学习，不断地消除了“余悸”，因此，我在出国时能主动积极地去担负起一个代表同时又是一个译员的双重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去认真学习先进经验和增进国际友好交流，赢得更多朋友的任务。这次通过学习《决议》，自信一定会毫无顾虑地尽己之能，来担负起各方面交予我的任务。

不望洋兴叹，振兴我中华

李家乔

由于我在国际交换组工作多年，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书刊，包括某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宣传报道。特别是对比人家在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大发展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动乱、大倒退，不免望洋兴叹，自叹不如。但看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六中全会，我国所出现的伟大转折，又通过这二年多来参加民盟组织举办的各种形式的学习，我深深感到，不论哪个外国的哪一方面多么令人羡慕，但这些终究不是我们自己的。望洋兴叹无济于事。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大家同心同德，在六中全会选出的党中央及其制定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尽己之能，尽快地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振兴我中华才是真正的幸福之路。